

Z G X D W X Y J D J



中国现代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U JIDUJIAO

文学

与基督教

● 许正林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

许正林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 / 许正林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 2

ISBN 7-81058-295-X

I. 中... II. 许... III. 现代文学-关系-基督教-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692 号

责任编辑: 孙立群 封面设计: 王春杰
责任制作: 张继新 责任校对: 张 懿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

许正林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200072)

(E-mail: sdcbs@citiz.net 发行热线 56331131)

出版人: 李顺祺

★

上海广服电脑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625 字数: 200 000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50

ISBN 7-81058-295-X/G·197 定价: 14.50 元



内 容 提 要

基督教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有特殊的背景：其一，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笼罩在一片基督教浸淫的圣气灵光中，教会、教徒生活成为社会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现代作家绝大多数接受《圣经》影响或教会教育或入过教。其二，《圣经》汉译，成为最早的欧化汉语，在语汇和文学情感上都潜在影响白话文学。其三，直接催化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西方文学给中国作家们带来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带来自主人格、感伤、忏悔、“爱”、“神秘”象征等艺术情感时，也潜在地带来了作为这些文学思潮与艺术情感总背景的基督教意识，并启示中国文学思想家们认识到：文学家也应该是宗教家。其四，“五四”文化先驱者们在民族文化反思与西洋文化的审视中，企望以宗教的向上信仰、人格道德、博爱精神来启蒙民心；同时，宗教（基督教）也成为“寻求精神家园”的中国作家们自我启蒙的需要。

基于以上所述的多重背景，中国现代文学被注入基督教文化的因素是难以避免的。正如始于20世纪及其之前较长时间的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选择难以避开西方文明示范的诱惑一样。但相对而言，基督教以一种西方文化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时，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中国人对宗教的冷漠、拒绝，有出自文化基因的深层影响，也有来自基督教在进入近代中国时采取了依附于炮舰侵略的反文明方式的影响。本文意在探究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宗教给中国现代作家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总背景又是西方文化一部分，在中国文学跨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亚文化层的认知文化、价值文化和审美文化的角色作用。

宗教问题受到中国现代知识精英的关注，实际上是其现代文化构建中审视与移借西方文化的附属品，这一方面有戊戌维新思想者的向





传统宗教寻求文化资源的先导,另一方面在于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背景角色。不过基督教对于中国现代知识精英们的文化探知是艰苦的。这不仅在于基督教自身的超验信仰方式和与之同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等对立性思想观念的影响,还在于基督教进入近现代中国时裹挟了太多西方列强政治上乃至传教士们人格上的污秽。这使得中国现代知识精英们面对宗教总是显现出一种双重性。如鲁迅一方面敬慕耶稣的献身人格崇高,另一方面又痛心于献身者不为大众所理解的孤独以及不敢侈谈宗教的心理压力;周作人同样崇敬基督教,却又执着于世俗,拒绝“忏悔”与“爱”;闻一多则更明确地自我表示:基督教的信仰已失,基督教的精神还在心里烧着。

价值构建中的宗教参与一般会延伸到思想观念、信仰崇拜和道德规范等多个方面,而在中国现代精神的价值寻求中更多地倾向了基督教的伦理资源方面。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的本质性关联主要在于中国现代作家们“立人”与“自立”的价值期待。一方面,他们试图建树一种福音书中耶稣爱与献身的人格,另一方面他们又多以《旧约》中的道德律令作为现代社会伦理批判的价值尺度。其中,许地山、冰心、巴金明显倾向于前者,而老舍、张资平、萧乾倒更多地倾向于后者。虽然他们有“宗教”与“非宗教”的不同,其本质上的宗教建设性是一致的。

基督教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视界带来了独特景观:在审美理念上,郁达夫、艾青的诗学净化;在审美意象上,郭沫若的“复活”创造,曹禺、艾青对“光”的创造;在审美趣味上,郁达夫、徐志摩对感伤的独钟,徐志摩对崇高与虚无的敏感,陈梦家、曹禺对神秘的感悟;在审美价值追求上,郭沫若、郁达夫的忏悔复归之路,郁达夫的“向善”焦虑,徐志摩的生命之爱,曹禺的罪感体验与救赎期待,艾青的殉道与爱等。

本文最后概括了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基督教影响的基本特征:宗教影响表现为一种文化影响,表现在“上帝”观念被世俗化,揭去耶稣身上的神学外衣而取其“牺牲”、“宽恕”、“博爱”精神;强调宗教对人的“信仰”力量与“爱”的力量;在作家自我更多地是一种“灵”的追求;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伦理色彩,无论是基督教意识的,还是非基督教意识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基督教意识因社会时代的影响而呈现出一种波浪式轨

迹,但宗教意识始终服从于民族主义:“五四”时期基于文化启蒙的积极宗教倡导;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因民族危机而强烈地非宗教;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再次回头于宗教,希望于此振兴民族精神,同时也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自洁与默默奉献的人格追求,基督教正是作为一种社会变革需要和作家人格自我塑造需要而被中国作家们所接受与表现。表现为基督教意义的生命意识、人格主义、向上意志、忧患意识、忏悔意识、献身意识、“爱”的理想、人道主义和道德批判等积极因素,构成中国作家的艺术情感的重要部分,亦即中国现代文学主体精神的重要部分,这些已逐渐受到人们瞩目。基督教使中国现代文学表现出的深厚人性内容的那一部分,将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作者简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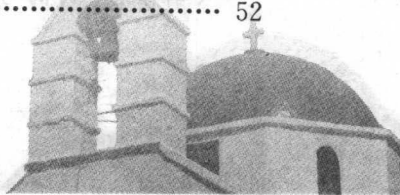


许正林,男,汉族,1958年10月生,湖北沙市人。1992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1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传播、新闻与传播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已出版作家传记《老舍》,合作专著《基督教文学》、《湖北当代文学概观》等,主编《冰心诗全编》、《冰心散文全编》。在美国《The Chinese Theological Review》,加拿大《文化中国》,新加坡《新加坡作家》、《五月诗刊》,香港《道风汉语神学学刊》、《诗双月刊》,国内《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北京图书馆馆刊》、《南开学报》、《文史哲》、《上海大学学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江汉论坛》、《长江文艺》、《华文文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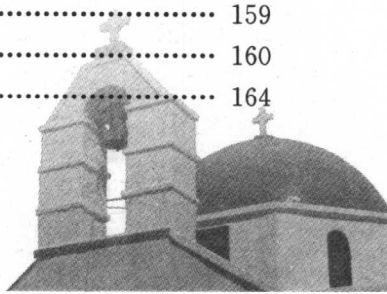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1
绪论 基督教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	1
一、在圣气灵光中：基督教与现代中国	2
二、最早的欧化汉语：《圣经》与白话文	7
三、上帝之维的缪司：“基督教与文学”	10
四、并非误区：宗教与“五四”前后的文化启蒙	15
第一章 基督教在现代作家文化探知中的角色	22
一、鲁迅：孤独的旷野呼唤	22
（一）宗教文化观	22
（二）宗教文学观	26
（三）作品中的宗教意识	29
二、周作人：被“上帝”拒绝的传道者	32
（一）宗教的文学史观	32
（二）“人的文学”内涵	36
（三）拒绝“忏悔”与“爱”的人格	41
三、闻一多：强者宗教的塑造	44
（一）立人立国前因	44
（二）个体信仰的价值系统	46
（三）独立的人格自塑	52



第二章 基督教在现代作家价值建构中的参与	55
一、许地山：“爱”的哲学与救世主义	55
(一) 异教杂糅的精神浪游者	55
(二) “爱”的文学精神	57
(三) “忍耐”的生命哲学	59
(四) 宗教救世主义	62
二、冰心：带锁链的爱的使者	64
(一) 从《圣经》演绎的诗	64
(二) “爱的哲学”逻辑	72
三、巴金：“爱”的哲学与人道主义	77
(一) “爱”的哲学	77
(二) 信仰观念	81
(三) 生命意识	83
(四) 献身人格	85
(五) 人道主义	86
四、老舍：在“圣徒”与“恶徒”中的思考	88
(一) 十字架的启示	88
(二) 信徒众生相	90
(三) 理想的宗教人格	93
五、张资平：在性爱与宗教的透视中	97
(一) “感化”与“爱他”的宗教观	97
(二) 道德上的非宗教	99
六、萧乾：未完成的非宗教作家	101
(一) 十字架的阴影	101
(二) 伪善者的群像	104
(三) “爱”的虚妄	106
第三章 基督教在现代作家审美视野中的渗透	109
一、郭沫若：忏悔与复活之路	109



(一) 浪漫主义与基督教	109
(二) 孤独中的皈依	111
(三) 凤凰的复活	114
二、郁达夫: 感伤、忏悔与道德目标	116
(一) “信神的强迫”	116
(二) 从《圣经》论感伤	117
(三) “向善的焦躁”	121
三、徐志摩: 崇高而虚无的宗教追寻	123
(一) 生命之爱	123
(二) 感伤人生	125
(三) 宗教之“爱”	127
四、陈梦家: 意识深处的上帝	129
(一) “牧师的儿子”	129
(二) “爱”与“神秘”	134
五、曹禺: 罪感体验与神秘感悟	136
(一) 索评人生	136
(二) 罪与救赎	139
(三) “光”的启示	142
(四) 感悟神秘	145
六、艾青: 在耶稣“生”与“死”的感召下	148
(一) 《圣经》的人格启示	148
(二) 宗教的诗艺净化	150
(三) 诗中的“殉道”与“爱”	152
结论: 基督教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	156
一、文化意识的情感: 基督教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	156
(一) “上帝”形象的世俗化	157
(二) “耶稣”形象的世俗化	159
(三) 宗教情感的伦理化	160
(四) “灵”的追求	164



二、从启蒙到“精神还乡”：基督教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

轨迹 169

(一) 基督教与启蒙 169

(二) 反帝与反教 170

(三) 宗教意识回归 171

三、文学与宗教契合：文学永恒价值期待 172

参考文献要目 175

附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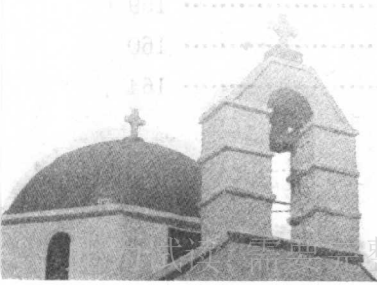
博士论文答辩录 184

附录二

冰心散文：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199

老舍的散文艺术 213

后记 223





绪 论

基督教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

闻一多认为：中国文学两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第一度是印度的佛教，第二度是西方的基督教。他说：“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小说戏剧是欧洲文学的主干，至少是特色。）你说这是碰巧吗？”^①这是一种文化巨人的见识。他至少启示了我们两点：第一，历史上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几次大的兴盛，都曾得力于外来文化的滋润；第二，这种外来文化影响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影响，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宗教的影响。无论是佛教与魏晋、隋唐文化，还是基督教与明末、清末文化，都无不说明这种宗教影响。这正如 T·S·艾略特所说的：“促使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产生共同文化的主导力量，就是宗教。”^②

如果说，文化是指一定的人类群体在世世代代的历史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体系、社会组织、生活方式的总和；如果说，文化是指一定的经济基础与时代思想之上的社会政治组织、科学技术、道德、法律、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等。那么，自中世纪以来，基督教就既是西方文化的总背景，又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基督教文化这种特殊文化背景的，既有来自时代社会生活的，也有来自语言的，同时还有来自西方文学的，但最基本的还在于“五四”知识精英们构建现代精神时的文化探知。

① 孙党伯、袁睿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② 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





一、在圣气灵光中：基督教与现代中国

基督教进入中国有四次高潮。第一次是唐太宗贞观九年的景教入唐。据“大秦碑”记载，传教士阿罗本(Rabban Olopen)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到达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太宗曾派丞相房玄龄率仪仗队郊迎十里，宾馆入住，并以其“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而准其“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翻经书殿，问道禁围，特令传授”，不久即传播各地。景教教士阿罗本被封为镇国大法王，常入宫宣释教义，除了取得皇帝的支持外，景教入华在教规仪轨上也采取了较大的人乡随俗变易：其一，长安大秦寺悬挂皇帝唐太宗肖像；其二，主教以上职位的教士可以娶妻生子；其三，接受传统宗教俗称，称教士为僧，使徒为天使、圣者为法王。因此，景教最盛时的情况是“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这种繁荣局面，自太宗始，持续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等多代，此后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代景教旺势渐弱。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秋，唐武宗颁令灭教，虽只针对佛教，景教也受到牵连。据《旧唐书·武宗本纪》中记载：“大秦穆护等祠，释教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敕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到唐末黄巢农民起义时，起义军攻陷广州后，杀掉15万伊斯兰教、犹太教、景教、袄教信徒。景教自此在中原绝迹。

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已是元代。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两个教派，即聂思脱里派和罗马天主教派，统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是基督教蒙古语的音译，意为“信奉福音或有福缘之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蒙古诸部中已有信奉景教的。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景教再度传入内地有了契机。如受忽必烈委派的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就“有志于推广教法”，并在江南修建了著名的景教“七寺”。除镇江外，还有扬州、大都(北京)、西京(大同)、甘州(张掖)等地。《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记载说：“在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皆





有聂思脱里派及其教堂。”1330年,西亚索尔坦尼亚总主教宣布当时中国北部的景教徒有3万人,并说:“他们相当富裕,建有很美观的教堂,陈设敬拜上帝和先知的十字架与肖像。”事实上,元代景教徒究竟有多少,很难确切知道。为加强对宗教的管理,元政府从西亚亚美尼亚波斯湾到远东,唐兀和汗八里,共设25个主教区,在中国境内设有四处主教区,建主教驻节堂。即第11区的秦尼(大同)、第19区的喀什噶尔、第23区的汗八里(元大都)和第24区的唐古忒(甘州)。13世纪40年代,蒙古势力侵入欧洲纵深,罗马教廷与欧洲各国君主深感不安。出于政治、军事、宗教上等多种考虑,罗马天主教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鲁布鲁克等人先后出使蒙都和林,至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特使约翰·孟高维诺抵达汗八里,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孟高维诺首先是劝化原信奉宗教的蒙古贵族皈依基督教;其次是收养幼童,使其信仰天主教;其三是在中国建立教堂。由于孟高维诺传教成绩突出,罗马教廷特在汗八里设立总教区,统理远东教务,并派格拉德、裴莱格林、安德鲁等人来华协助孟高维诺。1313年,泉州主教区设立,格拉德任主教。天主教信徒最多时达到3万人。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开放并蓄的宗教政策,很多贵族自己就是基督教徒。据当时传教士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说:“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但随着1368年元朝覆灭,“也里可温”也随之消亡了。

明朝末年,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基督教来华传教活动。1583年,罗明坚、利玛窦二人获准入广州自由传教,很快打开局面,兴建教堂,广交地方士绅,发展信徒。受此鼓舞,利玛窦进一步改进传教策略:其一是“儒化”方式,习汉语,着儒服,读儒经,行儒礼;其二是以学为媒,与知识分子交友,传播西学;其三是走上层路线,取得士大夫、皇帝支持。1601年利玛窦获准入京传教,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李天经、王微、瞿式耜、杨廷筠等名公贵卿都先后受洗入教,利玛窦等人用传播西学为媒达到传教目的,客观上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其西学东渐之功迄今仍多为学术界所肯定。现在看来,利玛窦等人的学术活动也是有局限的:其一,利氏等人来华时,已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时期,但这些传教士们所持仍是保守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对达·芬奇、马基也弗理等时代人物绝无介绍;其二,所传介只是欧洲古典科技,虽也提及哥白尼之“地球自转”说,又斥之为“实非正解”;其三,为增加中国人对天主教的憧憬与信仰,美化西方社会,所以徐光启信以为真:“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久安长治如此。”1610年,利玛窦去世,礼仪之争渐起,1621年南京教案成为反教序幕。但至清初康熙帝仍采取开放政策。至18世纪初,已有澳门、南京、北京三个教区,信徒达27.3万人。随着信徒规模扩大,“礼仪之争”很快由文化之争成为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的权威之争。康熙皇帝针对罗马教皇的《禁约》,宣布全国禁教,驱逐传教士。到雍正年间,全国200余所教堂被捣毁,2000名耶稣会士被逐往澳门。第三次传教高潮旋即结束。

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到顶点,到中国传教又一次掀起高潮。远在鸦片战争前的1807年,英国的马礼逊(Rober Morrison)等人来华传播改革后的新教,翻译《圣经》,创办报纸,设立学校,提倡男女平等,创立女子学校。但基督教在华传教的真正突破是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南京不平等条约”并列了两项条款:外国商人可以在中华全国各地贩卖鸦片;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全国各地传道。从此,“基督教化意味着殖民化”,传教士利用教堂、学校和医院赢来西方文明的统治。据20世纪20年代初基督教会(新教)统计,中国受餐信徒达3449974人,具体分布如下:

广东	61262人	山东	41821人	福建	38584人
江苏	29783人	浙江	27902人	直隶	22283人
东三省	20586人	湖北	14725人	四川	12954人
河南	12418人	湖南	11018人	贵州	9446人
山西	7827人	云南	7816人	陕西	7081人
安徽	5070人	广西	4722人	甘肃	1336人 ^①

再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713个县

^① 罗章龙编:《非宗教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9~10页。





中还没有占据的,只有 126 个县,其余的都树立了基督教的旗帜。”这对于一个“非宗教的民族”的中国,无异于笼罩上一层摆脱不掉的阴影。

19 世纪到中国传教的主要是基督新教。新教的传教武器是《圣经》。新教徒坚信一旦翻译好《圣经》,就可以自行教化民众。1823 年马史孟与马礼逊的两种中文《圣经》译本分别出版。1855 年中国各地教士代表又将《圣经》译本校订一次,是为 Delegates Version,即“圣经合和本”。据 20 世纪 20 年代初萧子升统计,19 世纪中叶到“五四”运动前后,《圣经》在中国的发行情况为:

- 1865 年 上海、福州两处共印 121 300 本
- 1866 年 上海、福州两处加印 265 150 本
- 1869 年 发去 216 485 本
- 1887 年 一年中销去 252 876 本
- 1893 年 销去全部《圣经》3 978 本,《新约》与《旧约》书 8 845 本,《圣经》中教本 182 392 本,三项共计 192 225 本
- 1894 年 销去 305 725 本(比上年增 113 500 本)
- 1895 年 销去 396 542 本(比上年增 90 817 本)
- 1899 年 销去 455 725 本(比上数增 59 183 本)
- 1900 年 销去 505 625 本(比上年增 4 990 本)
- 1905 年 销去 537 304 本(比上数增 31 679 本)
- 1908 年 销去 594 952 本(比上数增 57 648 本)
- 1909 年 销去 849 276 本(比上年增 254 324 本)
- 1911 年 销去 1 146 713 本(比上数增 297 437 本)
- 1913 年 销去 1 653 965 本(比上数增 509 252 本)
- 1914 年 销去 2 044 500 本(比上年增 390 535 本)
- 1915 年 销去 2 900 500 本(比上年增 856 000 本)

以后每年销去大约逐年增加一百万本以上。^①除《圣经》以外,其他宗教读物发行量也惊人。1918 年 4 月由教会出版的《中国基督教中

① 罗章龙编:《非宗教论》,巴蜀书社,1989 年版,第 18~19 页。



文图书分类目录索引》所列图书就有 3 451 种,这其中还不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中文出版物。再据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统计,1850 年教会学校约 50 所,学生约 1 000 人,到 1926 年教会学校发展为 1.5 万所,在校生约为 80 万人,占当时全国学生总数的 32%。

教堂遍布全国城乡,《圣经》进入家庭学校,构成一个系统的文化传播网络。这种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充满圣气灵光的基督教文化氛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突出影响是:

第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大多数作家直接受染于宗教,据现有可靠资料表明:

直接出身于宗教家庭的作家有:林语堂(福建龙溪基督教牧师家庭)、陈梦家(浙江上虞牧师家庭)等。曾经皈依过基督教的作家有:许地山、冰心、闻一多、陆志韦、老舍、苏雪林、庐隐等。接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作家有:许地山(燕京大学)、冰心(北京贝满女中、燕京大学)、庐隐(北京女子慕贞学校)、张资平(广东广益中西学堂)、郁达夫(杭州之江大学预科、惠兰中学)、徐志摩(上海浸信会学院——沪江大学前身)、林语堂(福建龙溪铭新小学、厦门寻源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周作人(日本立教大学——三一学校)、赵景深(安徽芜湖圣雅各小学)、陈梦家(燕京大学)、萧乾(北京崇实学校、燕京大学)、施蛰存(杭州之江大学)、胡也频(福州基督教会中学)、余上沅(武昌文华书院)、熊佛西(汉口圣保罗中学)等。

通过《圣经》等途径接受基督教影响的作家有:胡适、鲁迅、郭沫若、徐志摩、茅盾、冯文炳、曹禺、艾青等。

第二,出现大量直接表现教会生活(认可的或批判的)、或宗教情感、或基督教题材的作品,兹将其代表性作品归列如下:

胡适:《耶稣诞节歌》;许地山:《缀网劳蛛》、《商人妇》、《玉官》等;冰心:《晚祷》、《傍晚》、《使者》、《孩子》、《沉寂》、《天婴》、《我的学生》等;朱自清:《自从》、《睡罢,小小的人》、《旅路》;周作人:《歧路》;鲁迅:《复仇(二)》;徐玉诺:《哀求》;茅盾:《耶稣之死》、《参孙的复仇》;庐隐:《余泪》;陆志韦:《黑影儿》、《向晚》等;郁达夫:《南迁》、《迷羊》、《风铃》;郭沫若:《落叶》、《双簧》、《圣者》;田汉:《午饭之前》;王独清:

